

文学如何触摸历史 ——评《金陵十三钗》《南京安魂曲》中的大屠杀叙事

郭全照，布莉莉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记忆中不可承受之重，作为史无前例的民族伤痛，其残酷、暴虐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想象极限。但是，这不应成为我国作家书写和言说的禁忌与逃避的借口。美籍华裔作家严歌苓、哈金迎难而上，各自推出了《金陵十三钗》和《南京安魂曲》，在艺术和思想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通过深入两部小说的内部，细致分析它们的开头、叙述者的设定、语言和叙事上的特点，在比较和参照(西方二战题材的“创伤小说”)中，揭示两者背后的思想潜设与伦理指向，对它们的成就和不足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金陵十三钗》；《南京安魂曲》；南京大屠杀；创伤小说；开头；叙述者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4-0207-04

大屠杀一直是时代表意的焦虑，这一巨大的言说重压一方面抑制甚至淹没了当代的想象力，另一方面也可能激发和成就一些作家的写作抱负。事实上，在国外的当代小说中，描写战争创伤、书写心灵戕害的作品不在少数。如：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鸟之歌》(塞巴斯蒂安·福柯，1994)；反映越南战争的提姆·奥布里安的《如果我死在战斗区》(1995)；刻画二战中犹太人不幸遭遇的《四处散落的碎片》(安妮·迈克尔斯，1997)、《辛德勒的名单》(托马斯·肯尼利，1982)、《钢琴师》(瓦拉迪斯罗·斯皮曼，1999)、《朗读者》(本哈德·施林克，1995)等。专门研究创伤小说的英国学者安妮·怀特海德的分析表明，这些小说都在探索利用比喻表达和间接表达的新叙述模式，因为大屠杀表现了历史连续性的一种断裂，通过传统的知识框架是不可知的。^{[1](95)}研究表明，类似于二战、大屠杀这样的创伤经验，包含一种令人不知所措并抗拒语言或表达的力量。创伤加之于表达的挑战，使得历史真实再也不能直接呈现或在传统的现实主义模式中被表达。^{[1](99)}这种言说的巨大压力，对小说的形式与叙事策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其在传统的书写模式中寻求突围，知其不可言而言之。

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记忆中不可承受之重，作为史无前例的民族伤痛，其残酷、暴虐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想象极限。但是，面对1937年12月那场惨绝人

寰的大屠杀，中国当代小说的笔触一直畏葸不前，缺乏勇气；当代作家在写及这一题材时也只是旁敲侧击，缺乏直面此历史苦难的作品，更遑论杰作。而反观国外，则有如上众多优秀的战争小说、创伤小说。中国当代文学对此一题材的不作为，不能不说是一种艺术担当和历史责任的缺席与逃避。2011年，两位华裔作家——严歌苓、哈金——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锁定于1937年12月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各自推出了自己的长篇《金陵十三钗》(严歌苓为顺应张艺谋同名电影需要，由最初完成于2004年的中篇增扩而来，本文分析用的是原中篇版，约5万字)和《南京安魂曲》，不管其成就如何，至少填补了这一空白。但是，这两部小说在面对同一题材时，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路数，一个追求“故事感”，强调戏剧性冲突；一个侧重“记录性”，叙述克制、平实。

以色列当代小说家阿摩司·奥兹在随笔集《故事开始了》中说：“一篇故事的任何开头，都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合同。”^{[2](9)}在奥兹看来，“开始讲一个故事，就像在餐馆和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调情。几乎每个故事的开头都是一根骨头，用这根骨头逗引女人的狗，

收稿日期：2012-04-25；修回日期：2012-05-28

作者简介：郭全照(1977-)，男，山东威海人，南京大学文学院2009级博士，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大外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布莉莉(1989-)，女，山东梁山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2011级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而这条狗又使你接近那个女人”。^{[2](3)}所以故事的开头是应该细读的,不同的开头会邀请读者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作品之中。

《金陵十三钗》的开头是这样的:“我姨妈书娟是被自己的初潮惊醒的,而不是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城外的炮火声。”^{[3](1)}在这里,严歌苓采取了其一贯的叙事立场,以个体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切入宏大历史,她用了一个“是……而不是”的判断句式,将国家历史推向幕后,以月经初潮这样极为私人化的体验开头,上演了一幅个体命运沉浮的戏剧图景。不难看出,在《金陵十三钗》中,严歌苓所执着书写的仍是被主流历史话语所淹没的充满个人生命体验和情感细节的小历史。而哈金《南京安魂曲》的开头则是这样:“本顺总算开口说话了。我们聚在饭厅里,听那孩子讲了整整一晚上。”^{[4](2)}1937年12月,本顺在一次为美国雇主做事的时候被抓了,并被逼为一帮日本人做苦力,当时他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这帮日军士兵在这个城市肆意杀伤抢劫,而他在惊恐中目睹了日本军队的暴行。这一艰难的开始,拉开了全书黑暗寒冷的序幕。这也显示出哈金面对历史悲剧时所承受的巨大言说压力。

窥一斑而知全豹。两个开头,揭示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写作态度。那段惨痛的历史对于哈金来说,太过严肃、太过沉重,要找到恰当的切入角度实为不易。哈金小说的开头就让人感觉,之前还有一个潜在的开头(一个开头前的开头),那一开头即是从历史到小说叙事之间一段漫长的艰难跋涉,它一方面吸引读者,同时也令人感到某种凝重与恐怖。当本顺开始叙述时,我们一下子陷入日军侵占民国首都南京的恐怖中。历史现场已经幽灵般侵入读者的阅读空间。饭厅或客厅里的“我们”将直接走进这一严肃的开场“合同”所打开的历史时空,“本顺”要求着“我们”的郑重倾听。相比哈金的庄重、严肃,严歌苓的笔致则稍显轻佻。她给读者下了一个甜蜜的圈套,很轻易地就跟读者签订了一份去意识形态化的“合同”,即以个体叙事来言说宏大话语,以女性、成长置换家国、历史。严歌苓这种叙事方式的选择无可厚非,但是这种避重就轻的写法,总让人觉得轻飘,缺乏诚意。

二

这两部书中的叙述者的角色设定,也是很值得玩味的。在《金陵十三钗》中,叙述者是一双当下的眼睛,以“我”来讲述“我姨妈”书娟——大屠杀的亲

历者——的故事。小说的叙述者是他人故事的中介者,通过转述他人故事,严歌苓找到了一种恰切的表达经验的途径。但是,这里存在一个介入程度深浅和审视距离远近的问题,如果拿捏不当,很容易存在扭曲历史真实的危险,落入以当代价值审判历史的窠臼。文本中有很多细节表明了“我”的当代知识、文化、价值观念的在场。比如,在小说中描写“刽子手”聆听教堂女学生们天使般的歌声时,严歌苓这样说:“歌声播撒着声声追问,播撒着弱者的正义审判。一些信奉者持着屠刀迷惘了。”^{[3](38)}这样过于抒情的追问、义正词严的审判,只可能来自一个隔了多少年回望历史的旁观者的想当然猜测与同情,虽然正确然而无力,貌似动情但却矫情。类似的地方还有许多,如写到伤兵李全有在日本鬼子进教堂搜抓中国士兵的时候,他奋不顾身、拼死一搏,最终死于日军的刺刀之下。严歌苓这样写到:“中国军人(李全有)的脸变形了,五官全凸突出来,牙齿也一颗不落地暴露在嘴唇之外。这样一副面谱随着他手上力量的加强而放大、变色,成了中国庙宇中的护法神。”^{[3](45)}这些过于主观想象的修辞、藻饰、论断在叙述中跳脱游离,像在死者脸上敷粉,对于那段恐怖到极致、悲惨到极致的历史场景来说显得无益又廉价。毋庸置疑,这些后置的判断是正义的、且符合当代的价值取向。但是,严歌苓这种“画外音”般的抒情性判断却存在挪用的风险。它导致了一种令人厌恶的麻痹,潜在地模糊和普泛化了特殊的历史丧失的意义。

严歌苓这种迂回的当下视角的设置,可谓是“新瓶装旧酒”。虽然写及战时南京荼毒、惨痛的历史经验,但是叙述者目光聚焦的主要还是妓女与女学生间在身体和心理上的对峙、冲撞、转化与成长,以及作为插叙的陈乔治与红菱、豆蔻与王浦生、玉墨与戴教官的情爱事件。战争和大屠杀只作为布景般的存在,这也证明严歌苓志不在“史”,城市沦陷、生灵涂炭、地狱般的生存遭境只是作为全书的隐性线索潜藏其中,大舞台上出演的仍是一部充满猎奇色彩的女人戏。纯洁少女与肮脏窑姐的对峙本就极富看点,再佐以妓女与军士调情的“甜点”,严歌苓为我们烹制出一盘色泽鲜艳、口味酥爽的快餐。最后,为了保护女学生,妓女们假冒女学生,将自己交了出去,通过肉体献祭来实现人格美化,提升了道德与伦理上的弱势地位。在这里,严歌苓延续其一贯的写作态度(如《雌性的草地》《少女小渔》《扶桑》《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等),毫不吝啬地献上了对女性的讴歌与赞美。但是,在这里严歌苓却回避了一个更为本质和

核心的问题——即生命价值与伦理问题。“妓女”和“女学生”在生命价值上是否存在优劣与孰轻孰重的问题,是值得认真考量的。在西方语境中,面对死亡选择的时候,任何人的机会都应该是公平的,两种生命在大屠杀中无法选择,无论怎么选择都是悲剧。但是,在严笔下,对这种选择的艰难性与内心的挣扎、纠葛着笔太少,她绕过此一复杂思考,采取了一条最为轻易的道路进行叙事。从此处可以见出,严本身固有的立场和视野如何限制了其小说深入复杂事物的能力。大屠杀这样极端的生存困境,本是可以为小说家提供一个透视人性和生命价值的绝佳机会的。西方语境中的书写者曾就此问题陷入深深的忧郁和踌躇,如在《苏菲的抉择》《朗读者》《辛德勒的名单》等作品中,作者就生存、死亡、罪责等问题的复杂选择与悖论式的道德困境进行了深入思考。而在严歌苓的小说中,道德抉择则变得无比轻逸——用所谓的民族大义引诱妓女投入一种牺牲的幻觉,与此相对应的是引诱读者投入一种高尚的民族和道德的幻觉——即可以通过牺牲自我成就一种精神,一种民族的未来。^[5]

三

相比严歌苓的叙述路径,哈金则显示出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学质地。在《南京安魂曲》中,叙述者是战争亲历者安玲,通过她诚实、可靠的眼睛,来还原大屠杀时期的惨痛历史。哈金把叙述者设为安玲,是非常巧妙的。因为她和史上那些留下大屠杀见证的外国友人,如明妮·魏特琳、约翰·拉贝、约翰·马吉等人都有认识和接触,读者可以借助安玲的眼睛和耳朵,多方位、多角度地深入了解战时的南京。这样,既保证了叙述的多角度和丰富性,也使得当时的历史显得血肉丰满。哈金的这种文学设置,极好地增强了叙述的可信度。而这种诚实、可靠的叙事效果,对于创伤小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创伤小说需要建立一种包含读者在内的见证模式,来更好地传递创伤经验。它需要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使其搁置不信任的情绪。^[10]另外,这种可信度的取得,也得益于坚实准确的细节刻画。《南京安魂曲》建立在大量的史料、当事人日记、档案之上,叙事进展遵循严格的时间顺序,几乎每一事件都对应准确的日期,有一种近乎纪录片般的实录感。

仔细分析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其肌理中有两套叙事系统。一套即是上面写到的以金陵女子学院为地理中心、以明妮·魏特琳的行迹为主要内容,按时间

先后顺序记录的线性叙事。这一线头的叙事,时序有条不紊,日期一天天几乎可作为历史的简记。另一套是微叙事系统,即本顺和安玲的儿子浩文的故事。小说开篇就以本顺的倒叙“本顺总算开口说话了”^{[4](2)}引出大屠杀的恐怖氛围。随之,这一链条就被线性时间所淹没,直到第十三章才再次冒出“本顺总算开口说话了”。^{[4](87)}接着,安玲有条不紊的理性话语又将这一重复的片段、时间链条上的断裂取代。小说最后,通过路海给明妮·魏特琳的一封信我们得知本顺去参加抗日部队了。^{[4](263-264)}这里,本顺连自己发声的机会都没有了。这条线索时断时续、草蛇灰线般伏隐于明晰、顺畅的冷静言说之下,以一种错乱、断裂的话语(以致最后噤声),对安玲的历史叙事进行补充。小说的叙事者安玲耳闻目睹那么多的暴行惨状,在她视角内的叙述和回忆竟如此条理清晰,一切都明明白白,无所遮掩,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本顺这条隐微的、不被重视的叙事链条恰好补充了必然内在于创伤的裂缝和混乱的记忆。因为它是在理性清明、记述细腻的语流之上制造出的一个意味深长的逆向、折返和重现:象征了大屠杀记忆中那淤留于不可说之域的心理创伤、模糊与迷乱,它溢出了作者设置的叙事机器而不动声色地实施了一次潜伏式解构——被压抑者终要重返!

哈金给安玲虚构出一个“汉奸”儿子浩文,并自认为是推动此故事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其实,浩文这一情节线索的设置是这一小说中少见的一次想象力的张扬。儿子浩文让安玲无法冷静、无法安身,儿子的悲剧像幽灵一样不断纠缠着她、折磨着她:留学日本儿子被日本陆军强征入伍,给侵略中国的日军当医生,这使得痛恨日军的安玲平添一份隐秘的愧疚与罪感。她经历了,她活下来了,作为受害者,同时也额外背负了一份似乎不该有的创痛——因儿子问题,她也似乎不是完全清白于那场浩劫的。这是哈金自己的、也是哈金呈给读者的一个思考题。浩文这个虚构的人物更真切地传达了大屠杀经验本应具有的历史重量和道德相关性。小说不仅仅是“如实”呈现历史,它要把历史带入当下。

但是,翻阅《南京安魂曲》,铺天盖地的细节纷至沓来,读者很容易产生一种阅读历史科普读物的感觉。关于小说与历史的关系,乔治·斯坦纳在《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曾讲过一段相当精彩的话:“小说家并不希望篡夺记者和史家的地位。在19世纪小说中,革命和帝国在背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仅仅局限于背景而已。当革命和帝国所起的作用太靠近核心位置,例如,在狄更斯的《双城记》和法郎士的《诸神渴了》中出现的情形,小说本身在成熟性和独特性

这两个方面都会出现缺陷。”^{[6][19]}《南京安魂曲》在这一点上,显示出小说创造与想象的乏力。小说虽混合了事实和虚构,但“主要的细节都是从史料中一点一点抠出来的”。^[7]历史在这本小说架构中起了太靠近核心的作用,这样虚构和创造的空间就在历史的重压下显得极为逼仄,这对小说的艺术性和独特性的损害是很大的。哈金太拘泥于历史原始细节的呈现,追求一种“直接、毫不遮掩,没有迷雾。是甚么就是甚么,直指事物核心,全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自然主义的美学效果,不相信内涵的丰富和神秘性,即那种称之为“意义黑洞”的东西。^[8]与严歌苓相比,这种平实、节制、宽恕的笔致,是哈金在面对此一沉重题材的叙述选择与追求。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他的任务主要是要把故事讲清楚了,不能让大伙随随便便就忘了。哈金这种既宏大又诚实可靠的书写方式,以及把繁杂的细节创造成清晰故事的艺术追求,是无可指摘的,但是读来总觉得不太满足。

四

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貌似采用一种高调的个人主义立场,但小说中舍身取义的妓女们,除了几个主要角色(玉墨、豆蔻、红菱),其他人都是模糊不清的群像。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则不同,里面每一个

出场的人物都给我们留下了不容忽略的印象,甚至连那些避难的中国人也都给予了难忘的描写,有着轮廓清晰、不容混淆的面孔。这才是对民族苦难当中渺小、脆弱的个体的真正尊重。他不仅写到了日军屠城,还写到了大屠杀之后,魏特琳领导的金陵女子学院的重建和复兴,这隐约象征着某种希望和新生,其中也蕴含着对历史的反省。文学重要的不只是对过去的呈现,更重要的还在于呈现生活的可能性及对未来的启示。在此意义上,哈金的写作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惊喜。

参考文献:

- [1] (英)安妮·怀特. 创伤小说[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1.
- [2]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故事开始了[M]. 上海: 上海译林出版社, 2011.
- [3] (美)严歌苓. 金陵十三钗[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 [4] 思郁. 〈金陵十三钗〉: 妓女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EB/OL].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2-22/1OMDkwXzM5MDQ1OQ.html>.
- [5] (美)哈金. 南京安魂曲[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 [6] (美)乔治·斯坦纳. 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 [7] 孙宇挺. 小说〈南京安魂曲〉: 用西方视角叙述“大屠杀”[EB/OL]. <http://news.163.com/11/1107/14/718V51N600014JB6.html>.
- [8] 木叶. 哈金为民族苦难写安魂曲[N]. 文汇报, 2011-12-13.

How Literature Touches upon History? —A Narrative Analysis of Nanjing Massacre in *The Flowers of War* and *Nanjing Requiem*

GUO Quanzhao, BU Lili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Nanjing Massacre, which was committed brutality and atrocity beyond human imagination, has been an unprecedented national wound and unbearable heavines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But this should not be a taboo of speech and excuse of evasion for the Chinese writers. Two Chinese American authors, Yan Geling and Ha Jing, bravely took on the challenge and turned out their novels *The Flowers of War* and *Nanjing Requiem* respectively. Both are worthy of remarking and praising in art and thought.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depth of the two novels and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ir beginnings, their assignment of the narrator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language and narrative. And through comparison and reference (of the foreign Trauma Fiction on WW II), it also discloses the ideological implications and ethical intentions of the two novels in question. Moreover, it offers some independent ideas on the achievement and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two.

Key Words: *The Flowers of War*, *Nanjing Requiem*; Nanjing Massacre; Trauma Fiction; beginning; narrator

[编辑: 胡兴华]